

陸徵祥與中梵外交關係

田英傑著 陳愛潔譯

一月十五日是已故本篤會陸徵祥院長（1871-1949）逝世六十周年紀念。他在中國近代政治歷史上擔當一個有意義的角色，尤其涉及中梵關係這方面。在他的《回憶與反思》（*Souvenirs et Pensées*）一書裡，用以下的說話概述了他作為中國外交總長，如何嘗試建立中梵外交關係：

自從加入政府後，深信精神價值觀是更為重要的，也確信這些價值觀支持著所有尊重它們的國家；所以，我嘗試為民國爭取天主教會的合作。我曾經長時間觀察天主教會的工作和生

活，自己也成為一員。在一次適當的場合上，在內閣成員的同意下，我要求（北京）宗座代牧正式詠唱讚主曲（*Te Deum*），祈求天主降福中國。這樣的儀式是史無前例的創舉，在北堂舉行，外交使團出席。其目的是為中國與耶穌基督宗教並與天主教會之間的關係注入新的精神。我認為此舉只是開始而已。

一九一七年，我有機會繼續前進。我向政府建議與聖座達成協議，好能促成民國與聖座之間的外交關係。此項建議獲得批准後，我便開始

接觸梵蒂岡，對方也立即同意……然而，某歐洲強權聲稱要採取行動『保護』各傳教站，於是加以干預和有系統地反對，強迫我們放棄這個如此簡單和正常的計劃。直至一九四三年二月，即超過四分一個世紀後，計劃才達致。

陸徵祥如何實行這些倡議？我們可以從他當時在政府擔任的官職，以及從中國政府與天主教會的關係的政治背景，而找到解釋。本文的目的是就這雙重議題提供更多細節。

陸徵祥的政治生涯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零年八月十三日間，陸徵祥數度出任中華民國外交總長或國務總理。他是從外交官職務晉升至該等官職。

陸徵祥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二日生於上海，領洗加入基督教會，因其父親是基督教傳道員之故。他就讀上海廣方言館（外國語言文字學館），專攻法

文，其後入讀北京同文館並於一八九二年畢業。翌年，他奉派俄羅斯聖彼得堡，擔任中國大使館翻譯（直至一九零六年）。當時的外交國際語言是法文，但陸徵祥對俄語也熟練自如。當時的大使是致力改革的許景澄（1845-1900），十分關注他的事業，並訓練他擔任外交官。陸徵祥敬許景澄如父親。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二日，陸氏與來自布魯塞爾的比利時女子培德（Berthe Francoise-Eugénie）女士結婚。一九零五年，他在駐俄大使館升任參事，一九零六年升任駐荷蘭特命全權大使，並於翌年出任外交主管。一九一一年，他以特命全權大使的身份奉派回聖彼得堡。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廿二日，陸徵祥加入天主教會。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宣告成立，陸徵祥支持國民黨，並於一九一二年三月至一九一二年九月，出任以袁世凱（1859-1916）為總統的臨時政府的外交總長。在八月至九月，他更出任國務總理，但由於缺乏政治影響力，所以被迫辭任上述兩個職位。

然而，他很快被重召加入內閣，由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三年九月出任外交總長，在外交部推行改革和現代化。他廢除清朝遺留下來的複雜官僚架構，要求各職級的人員認識外語，並設立現代公務人員招募考試。他設法做到避免支持新政府的任何黨派，但這種相對的政治中立意味著他未能影響政策，所以再次請辭。一九一四年，他在法國和比利時出任中國特別使團團長。

一九一五年一月廿七日至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七日，他第三次在北洋政府出任外交總長。北洋政府獲得國際承認，與日本和俄羅斯進行艱鉅談判。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零年八月，他第四次出任外交總長。

聖座與中國政府關係的背景

即使著名的「禮儀之爭」帶來種種負面的後果，但在二七二零年至一八一零年期間，傳信部委派一位副總務長住在北京，而且在某程度上能夠與

中國當局調解。但是，隨著迫害增加，副總務長被迫離開首都。自十九世紀中葉，尤其是法國和英國，在取得軍事勝利後，便強迫中國簽署各項不平等條約，其中要求保護傳教工作和基督教教會及其成員（包括外籍和本土）的財產。法國給予天主教傳教會的「保護」普遍得到大部份法籍宗座代牧歡迎，但很快導致其他國籍的代牧抱怨，也引起中國當局暗地裡不滿。

在這樣的背景下，聖座和清朝廷都感到需要更直接的接觸。鑑於聖座需要評估中國傳教工作，所以採取主動：教宗決定計劃派員訪問中國境內的所有傳教區，委任徐類思（Celestino Luigi Spelta）主教在一八六零至六二年實行。作為宗座視察員的徐主教，收到聖座致咸豐皇帝的信函：

我們誠意希望向閣下表明我們的態度，並且，正如我們迫切渴望，能夠在閣下和我們簽訂協議……我們衷心懇求陛下保護所有居住在貴國廣泛地區的天主教徒，以及所有福傳工作

者、歐洲傳教士，好使天主教信仰能夠自由地在這些地區宣講。

信函的目的，是與中國政府締造協定。但可惜，由於咸豐皇帝逝世（一八六一年），徐主教又因病早逝，信函甚至很可能沒有交到首都。

其後，隨著在一八六零年及一八七零年分別簽署北京條約和天津條約，局勢漸趨惡化。但幾年後在某程度上回復平靜。一八八二年初，前香港總督軒尼詩（Pope Hennessy）致函傳信部，知會對方在一八八一年秋，當時負責朝廷外交事務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1823-1901年），要求他向聖座匯報中國天主教徒的情況，而希望聖座與朝廷之間交換代表，建立外交關係。可惜談判沒有繼續。

由於中法爲了越南而爆發戰爭（1884-1885年），新一輪的迫害出現，尤其在中國南部地區。教宗良十三世深爲天主教徒的困境所感觸，決定致書光緒皇帝。一八八五年，他委託羅馬宗座聖伯多祿

聖保祿修院的朱利亞尼（Francesco Giuliani, 1831-1898）神父把他的私人信函帶到清廷，信上的日期正是一八八五年一月一日。教宗要求皇帝恩待和保護所有國籍的傳教士和天主教徒。一八八五年四月八日，信函交到總理衙門。一八八五年四月十日，總理衙門代表皇帝回覆教宗。該信由朱利亞尼神父親自帶回羅馬。

李鴻章跟進這次交流，採取進一步措施，與聖座建立外交關係。一八八五年六月八日，他傳召在天津海關工作的愛爾蘭籍教友敦約翰（George Dunn），告訴他皇帝很高興收到教宗的信函，朝廷也願意爲在華的天主教傳教站提供更好條件，同時建議透過交換代表而與聖座建立正常外交關係。敦氏向北京宗座代牧戴世濟主教（Francois F. Tagliabue, 1822-1890）匯報會議的內容，也知會中國駐倫敦公使館的英籍秘書。他向倫敦的亨利·曼寧（Henry E. Manning, 1808-1892）樞機談及此事。一八八五年八月，曼寧樞機致函教廷國務卿盧托維哥·雅格比尼

(Ludovico Jacobini, 1832-1887) 樞機有關中國政府的建議，提到先前的倡議，並強調有關建議的積極效果。同時，一八八六年一月敦氏抵達羅馬，把李鴻章於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七日簽署的信函交給國務卿。

一八八六年二月四日，良十二世接見敦約翰。其後敦氏與傳信部部长若望·西默安尼(Giovanni Simeoni, 1816-1892) 處理有關事宜。同時雅格比尼樞機二次召集會議，讓所有相關人士參與討論。一八八六年八月四日，宗座駐印度代表安多尼·阿列瓦迪(Antonio Agliardi, 1832-1915, 1896年擢升樞機) 主教獲朝廷正式承認。翌日，《羅馬觀察報》澄清，中國政府已要求教宗的代表應該享有各種權威，好能有效地工作：「法國在華的行動是不合理的，應被視為排斥或限制聖座的權威，因為聖座享有原始權利來代表和保護它的宗教利益。」

有關談判的消息一日流傳，駐教廷的法國大使愛德華·勒菲弗爾·貝艾納(Edouard A. Lefebvre de

Behaine, 1821-1897) 公爵，聯同法國政府領袖查理·德·弗雷因納(Charles de Freycinet, 1828-1920) 強烈抗議，認為有關決定是企圖對抗法國保教權。八月十二日，法國更威脅與聖座中斷外交關係。

由於法國政府執拗，良十二世決定委派阿列瓦迪主教純粹以特別代表的身份前赴中國，收集有關中國教會和教友情況的資料。但是，法國反對阿列瓦迪主教的行程，再次威脅斷絕外交關係並揚言向法國天主教徒報復。法國的輿論，甚至重要的教會人物，都請求良十二世放棄倡議。因此，一八八六年九月，聖座通知敦約翰必須放棄該計劃，因為時機尚未適宜。中國當局在一八八六年十月六日透過敦約翰致函表示遺憾。

到了一八八八年底，聖座要求北京宗座代牧法籍的戴世濟主教，清楚明確地以書面匯報在北京設立宗座大使的優點和缺點。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三日，主教呈交了一份詳細報告。但報告未能對於中國，和對聖座的計劃提供任何積極意見，對中國當

局也沒有半點好評。報告的目的似乎是防止委派聖座代表。事實上，報告的結尾戴世濟主教懇請教宗繼續把中國天主教會的保護權委託給法國。

李鴻章對於有關計劃告吹甚感不快，於是在一八九零年九月，通過當時返回歐洲的德籍聖言會安治泰（Johann B. Anzer, 1851-1903）主教把另一封信交給教廷國務卿馬利安洛·蘭波納·丁達諾（Mariano Rampolla del Tindaro, 1843-1913）樞機。樞機也透過安治泰主教作出回覆。雖然沒有直接結果，這次書信往來卻表明雙方的善意，亦有利於一八九一、一八九二及一八九九年的常規接觸。

同時，在一八九一年十月七日，由於從中國傳來負面消息，丁達諾樞機於是致函教廷駐巴黎大使多明·費拉塔（Domenico Ferrata, 1847-1914）主教（於1896年擢升為樞機），表示教宗意識到有些嚴重事情正在威脅中國的天主教會，也意識到中國願意與聖座建立關係，於是決定派遣特使前往謁見清帝，請求他支持教會。法國政府仍頑強拒絕。費拉

塔主教於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四日回覆：「外交部長里博（Ribot）認為聖座現時委派特別代表到北京並不恰當而且危險。」同時，丁達諾樞機透過當時的教廷駐北京代表、法籍的樊國梁（Pierre M. Alphonse Favier, 1837-1905）主教，就有關教宗派遣秘密代表並在中國建立聖統制等議題，諮詢中方的意見。一八九二年一月的答覆，是清廷同意這兩項計劃，甚至建議繼續進行外交談判，而不考慮法國的立場。然而，聖座認為這並不合宜。

一八九五年，適逢慈禧太后（1835-1908）六十歲壽辰，聖座委派北京宗座代牧都士良主教（John Baptist H. Sathou, 1840-1899）向她轉達宗座的祝願。一九零零年二月二日，教宗良十三世慶祝九十歲生辰，慈禧太后與總理衙門也向他祝賀。

這些倡議逐漸在聖座與中國政府之間締造良好氣氛，雙方都確信有需要建立直接的關係。可是，一連串動亂和革命運動逐漸使清朝於一九一一年滅亡，亦拖延上述關係進一步發展。

陸徵祥嘗試推動外交承認

民國初年，北平與聖座雙方都有感需要建立更直接關係。在這有利的背景下，中華民國外交部總長陸徵祥敢於率先採取兩項行動，那就是在天主教北堂詠唱「讚主曲」(Te Deum)來祝福中國，以及進一步嘗試與聖座建立外交關係，好能終止這個令人遺憾的境況。

陸徵祥把上述的第一個倡議形容為「前所未有的革新」，可追溯至一九一三年四月，即他第二次出任外交總長期間，也是新中國國會召開的日子。在那次場合上，所有基督徒都應邀在他們的聖堂祈禱，請求天主降福國家和領袖。有關的要求和事件成爲西方報章頭條，連美國總統和內閣也注意到。《基督徒先鋒報》把袁世凱的行動比作君士坦丁和查理曼，讓異教國家降服於基督的軛。

然而，一位資深外交官於一九一三年九月七日提出較爲懷疑的評論：

幾個月前，中國透過民國政府的部長提出一個富戲劇性的要求，就是在某個特別的星期天，請所有基督徒一起祈禱。大西洋兩岸的聖職人員因而確信在北平的民國終於得出結論，就是基督宗教是達致現世和來世福祉的唯一途徑，並為先前的天朝得到精神啟導而奉獻祈禱。

陸徵祥的意圖並非那麼雄心勃勃，而是實際的。他解釋爲僅僅「爲中國和耶穌基督的宗教及天主教會之間關係提供新的精神。」

的確，整個氣氛變得較爲友善。一九一四年八月，樞機院指示北京宗座代牧林懋德(Stanislas F. Jarin, 1856-1933，自1905年擔任此職)向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宣佈教宗比約十世逝世的消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中方作出有意思的舉動。民國總統在一次類以呈交國書的隆重儀式上，接納新教宗本篤十五世的親筆信，信函由林懋德主教親自在

總統府遞交，知會中國政府新任教宗當選。林懋德主教亦在年底（十二月廿八日）獲得總統親函向教宗回覆。

在這些日子，在雷鳴遠（Vincent Lebbe, 1877-1940）神父的推動下，對法國保教權的不滿迅速擴散。這也合併有關改革福傳方法的建議，就是本地聖職人員擔當更重要的角色，更尊重中國文化和中國天主教徒的愛國感受。

可惜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因此，陸徵祥作為外交總長的第二個倡議，只可在一九一七年推行。當時，他開始接觸聖座，再一次提議互相作出外交承認。有關談判由於中國參與戰爭而延期。一九一八年春，陸徵祥透過摩納哥駐梵蒂岡代表的斡旋而再一次接觸。

七月十二日，聖座正式任命駐馬尼拉宗座代表若瑟·彼特雷萊（Giuseppe Petrelli, 1873-1962）總主教為駐華代表。中方亦於七月十七日授權中國駐西班牙和葡萄牙公使戴陳霖（1872-1960）兼任駐梵

蒂岡公使。當《羅馬觀察報》於七月十一日報導中國作出外交承認的消息，強調天主教代表一職的性質基本上是宗教的，也沒有披露代表的名字。

可是，有關消息公佈後，喬治·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領導的法國政府就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卅一日斷然反對，譴責有關決定是侵犯法國保教權，並威脅終止與梵蒂岡重新建立外交關係的一切談判，因為法國在一九零五年十二月九日會中斷談判。各方的指責都是針對彼特雷萊主教，因為他被視為支持德國。雖然聖座否認有關指責，但決定以皮薩尼（Pietro Pisani, 1871-1960）主教來取代他。可是，法國同樣對彼特雷萊主教不滿。

在衝突期間，克里蒙梭引述一八五八年中法條約第十三條，聲稱有權反對該項決定，認為是「顯然不友好的」行動；在這樣的情況下，「保留那個應該被認為是相應態度的解釋，則被視為有基礎的。」八月六日，中國外交部經過仔細考慮而作出明確回

應：「在整個事件中，一八五八年六月廿七日簽訂的條約並不承認法國有任何特別權利。條約的第十三條跟一八六五年的『中比條約』第十五條完全相同。況且，法國政府以自己聲稱擁有的『保教權』來公然反對。此外，『戰爭開始後』，中國並不是與聖座建立外交關係的唯一國家：『英國也採取同一方法』。中國保留所有權利，只是對『法國會覺得被蔑視』表示遺憾。」

法國不但繼續盲目地反對和指責，也試圖在北洋政府內玩弄不明確的手段，堅持得令後者被迫無限期押後交換代表的問題。衝突由於涉及論證，影響大部份中國天主教徒。

結論

在差不多四十年後，由於陸徵祥院長擁有中國人的慈祥和本篤會的培育，對於事件表達出溫和的判斷，正如上文所引述的：「某個歐洲強國的干預和有系統的反對……迫使我們放棄一個如此簡單和正

常的計劃。直至一九四三年二月，即等待了超過四份一個世紀，計劃才實現。」

陸徵祥在他於一八四八年完成的遺作『*Rencontre des Humanités*』（在他死後才出版）中，更客觀地評論過去的負面經驗：

我的思想可以綜合為幾句話：國際關係的問題，主要不是政治秩序的問題，卻首先是知識與道德的問題。在其基礎上，這是人與人之間聯繫與分裂的問題，是那團結與分隔他們文明的異同問題，是人類團體當中密切與多元的問題，因為人類團體是每個文明的角石！……：知識、道德和精神力量的融合，都是儒家和基督徒，同時是中國與希臘拉丁文明所擁有的，可以建構一股溫和的普世力量，是完全新穎，也是絕對無往而不勝的。

即使對今天的情況來說，這份經驗也是非常切實而有意義的。 □